

上世纪50年代初,中央博物院被正式命名为“南京博物院”。南京博物院延续了中央博物院考古工作的传统,自1949年至今,在考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工作:调查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;发掘南唐二陵;发现青莲岗遗址;发掘南京明代功臣墓;发掘南京北阴阳营遗址……

烽火岁月的智慧之光

从1933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栖身南京鸡鸣寺路(今北京东路),到1948年中央博物院在中山路(今中山东路)开馆,筹备处的人当时大概没想到,这段并不长的路程,因为战火的阻隔,却用了十多年才走完。

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



即将开馆的南博 现代快报见习记者 邱稚真 摄(其余为资料图片)

筹备南迁

鲁迅和胡适曾强烈反对文物南迁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中国的北方岌岌可危,于是国民政府计划将收藏在北京的大批文物精品迁移到南方,这批文物中,包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,也包括已经划拨给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古物陈列所的文物。文物南迁的消息,经当时的报纸披露后,引起巨大反响。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段勇,在他的《古物南迁的记忆与真相》一文中,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。

“最激烈的反对者以古物陈列所前所长周肇祥为代表,他发起组织了‘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’,在

太和门集会宣言‘誓与国宝共存亡’,并给支持南迁和参与南迁工作的人士打骚扰电话、寄恐吓信。著名学者胡适也对南迁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,忧虑古物一散难复聚,而寄希望于通过国际监督和干预来保障古物安全。古物南迁的同时,社会上有舆论责难华北高校南下请愿和逃难回家的学生,鲁迅发出了‘寂寞空城在,仓皇古董迁’的嘲讽。”

而即便在故宫博物院内部,关于古物是否南迁,也存在着争议,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吴瀛最

初就不赞成。最有意思的是,当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在为南迁做准备时,他的儿子马彦祥却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“要抵抗么?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!”除此之外,北平和外地的不少民意机构也纷纷通电,加入反对南迁的大合唱。

虽然反对声四起,但为了确保珍宝在外敌入侵时不致散失,古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。政府批准了文物南迁计划,而反对南迁的不少人士后来也参与到了古物南迁的行动中。

被迫西迁

1937年,中央博物院文物分成三路西迁

1936年夏天,最大一批文物通过京浦铁路到达南京浦口。当文物到达浦口时,朝天宫的仓库还没有建好。于是,文物在浦口装船又到了上海,存放在一个银行的金库中(注:也有说是在仁济医院仓库)。大约一年后,朝天宫的仓库基本建好了。文物又从上海回到了南京。

1937年8月13日,淞沪抗战爆发。日军一旦突破上海防线,首都南京也将陷入危机。所幸,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未雨绸缪,早就做好了文物西迁的准备。1937年8月14日夜,淞沪抗战爆发的第二天,中央博物院的第一批西迁文物抵达下关码头,悄悄上船起运,离开了南京。第一批文物离开后的第二天,日军飞机飞临南京上空,开始轰炸南京。

此时,中央博物院的第一期工程基本完工,人文馆大致建好。然而,大批文物却无缘在这里展出。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,大批文物被迫西迁。1937年12月10日晚上,最后一艘载满文物的船离开南京。三天后,日本军队占领南京。随后,日本派出330多名专家、360多名士兵

开始掠夺文物。而此时,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已经在西迁的路上,文物分成三路,其中南路从水路到达汉口,再到长沙、贵阳,最后到了四川巴县;北路,则从浦口火车站出发,经过西安、宝鸡,穿越秦岭蜀道,最后到达峨眉山下的大佛寺;中路文物离开南京下关后,经汉口、重庆、宜宾,到达乐山罗罗祠。

在祖国的大西南,这些国宝级文物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。虽然远离了战火,但土匪的骚扰却隔三差五就有。

为了安抚土匪,保住文物,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,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的徐森玉,甚至曾经把自己的一个儿子交给土匪做人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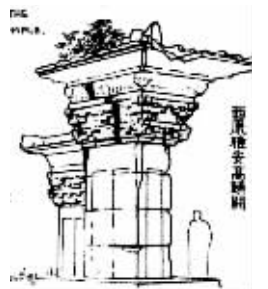
文物迁徙示意图

李庄的学术黄金期

中央博物院西迁期间,筹备处主任李济最终带领大家落脚在四川江边的一个古镇——李庄。在相对宁静的李庄,学者们度过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,更令人欣慰的是,就在这段岁月里,中央博物院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限于篇幅,仅举两例。



复制的司南



当时绘测的汉阙图

奇才王振铎 复制司南

在李庄期间,中央博物院有位叫王振铎的助理设计员,他的级别算不上高,但却是一位奇才。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司南的样子,就是由王振铎根据古文献复原而来的。

在王振铎复原出司南之前,司南失传已久,它应该是什么样子,没人能说清楚。王振铎在东汉王充的《论衡》中找到了古人对司南最为详细的记载:“司南之杓,投之于地,其柢指南”。王振铎认为:“杓”是勺状的东西,像喝汤用的调羹,“柢”则是“把儿”的意思,而“地”则是指罗盘。做个“杓”很容易,但“杓”怎么才能指南呢?王振铎想到了磁石,他用云南出产的磁石做了一个勺子,并通过实验多次证明它可以指南。

复制司南虽然成功了,但勺子做好后,磁性太微弱,不得不用电授磁,而授磁的办法古代是没有的。当时中国磁性最强的磁石在河北磁山县,但因为被日本人占领,无法取到当地的磁石。抗战胜利后,王振铎用磁山的磁石来试验,结果与人工授磁的效果完全一样。

除了司南之外,王振铎还复原出了宋代水钟等。

梁思成醉心 复原古代建筑

梁思成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大家,他本人并非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,但在抗战期间的李庄,经济困窘的梁思成受中央博物院的委托,加入中央博物院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,做了大量西南古建筑及附属艺术的调查。

东汉的张衡曾写有《两京赋》,其中“巍峨高耸、百尺入云”一类的关于建筑的描写,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夸张的手法,但按照梁思成等人复原的汉阙的高度确实很惊人,不低于今天保留下来的希腊巴台农神庙遗址。有一种观点,一直认为中国的木结构建筑简单,不能够做大体量,这个说法被不攻自破。

在李庄这块小小的天地里,古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展开。梁思成着手对古代中国的建筑史进行系统的归纳总结,动笔撰写古代中国建筑史。

1943年底,梁思成的《中国建筑史》终于成稿了,这是一部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。

今天的南博

延续了中央博物院考古工作的传统

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,中央博物院西迁的文物逐批返回南京。1946年12月,中央博物院建筑工程仍旧按照原计划进行。到了1948年4月,一期工程及附属工程竣工。上世纪50年代初,中央博物院被正式命名为“南京博物院”。

南京博物院延续了中央博物院考古工作的传统。自1949年至今,在考古方面,进行了一系列工作:调查南京附近的六朝陵墓;发掘南唐二陵;发现青莲岗遗址;发掘南京明代功臣墓;发掘南京北阴阳营遗址……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,南博还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学研究,先后编写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。

如今,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,

在原中央博物院的基础上,又有了新的发展。江苏境内的主要文物精品基本集中在南京博物院。旧石器时代的文物有马陵山脉、宁镇山脉和太湖地区的旧石器、动物化石。新石器时代的文物有马家浜文化、崧泽文化、北阴阳营文化、良渚文化、青莲岗文化、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石器、玉器、陶器、骨角器等。江苏彩陶和良渚文化玉器在全国有重大影响。商周时期铜山丘湾的大彭国社祭遗址、吴越青铜器、汉代玉器、漆器、六朝青瓷器以及宋元明清的瓷器等,都各有精品。另外,江苏历代名家的书画,南博也收藏不少精品。